封面·话题

读书,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

王木春

俗语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读书亦然。回顾诸多名家大师的读书经验,长枪短剑,南拳北腿,各有各的精彩。郭沫若和郁达夫认为,读书要从目的出发,或为学习而读书,或为创作而读书,或为研究而读书等,目的不同,读法不同;而夏丏尊认为,读书应该视不同类别的书而异,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梁启超、林语堂提倡趣味主义,陈垣、梁实秋则反对读书只凭兴趣,认为要养成苦读的习惯……尽管如此,从名家林林总总的读书经验中,仍可梳理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的‘读书经’,以资借鉴。

视觉中国 供图

1 “随便翻翻”

不少民国名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可奇怪的是,成人后的他们却承认自己真正的阅读启蒙,大多来自小时候那些漫无目的的‘杂览’。周作人在《读书的经验》一文中说:“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后来懂得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是他长期博览古今中外的书籍后‘暗中摸索’出来的。

同样,美学大师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回忆儿时的阅读,也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等科举应试的‘敲门砖’,但他不满足于此,偷偷浏览了大量‘闲书’,从《史记》《战国策》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剧,乃至《麻衣相法》等杂七杂八的书;“总之,我幼时头脑所装下的书好比一个灰封尘积的荒货摊,大部分是废铜烂铁,中间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直到上了大学,朱光潜才开始接触外国作品。然而,正是少时的正规训练和杂览旁收,奠下了朱光潜一生的写作‘基因’。

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涉览,即鲁迅颇为推崇的读书法——“随便翻翻”。鲁迅在一次演讲中希望年轻学子们看书首先要“杂”,他将杂览比作游公园,“随随便便去……所以会觉得有趣”。

读闲书,除了轻松有趣,还便于打开视野,增进常识,同时读者能从中摸索出读书的门道,发现自己的“趣味”所在。1923年,梁启超为当时《清华周刊》推荐‘国学入门’书目时说:“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为此,他专门推荐了一部分‘有趣’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兴趣是学问的导师。人一旦找到了契合自己的“趣味”,也就遇见了自己的天赋所在,往往会产生浓厚的探究欲望,乐此不疲,成就一番事业。这也是林语堂所称的‘自动读书法’。

今天,人们忙里偷闲之际,喜欢“随手翻翻”手机,上天入地,漫游一番,或刷新闻,或浏览电子书,我以为都算作‘杂览’,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习惯。

2 读“基础书”

当然,只凭个人兴味而‘随意翻翻’的人,或许能成为‘无所不通’的杂家,却很难在某一领域成为行家里手。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晚年总结一生的读书经历时,却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不得法”。他说年轻时求知欲很强;“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到了40岁,一会儿学德语,一会儿学法语,可都不算精通,后来去德国大学学习,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课,相关的参考书,也乱读起来,终究没能在具体某学科有所建树。蔡元培的话固然是自谦,但其中的道理,足以给读书人一个提醒,那就是读书不可泛滥无边,必须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尤贵在‘博’的基础上有所‘专’。史学大师陈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谈话中,就要求学生做到博与专的‘辩证统一’:“世界上的书多得很,不能都求甚解,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必求甚解’的书。”

可惜,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没有觉悟到这点,结果是:阅书无数,一事无成。

读书如何做到‘专’?民国大师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兹列举三点:

一是读‘基础书’。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籍愈来愈多,单是每年出版的新书就已浩如烟海,某种意义上说,书籍成了读书人的一种负担。朱光潜在《谈读书》中提到,中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不过,书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一生受用不尽”。而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读书万卷,然而真正‘留心’的却少得可怜,还由此养成了浮浅虚骄的习气。至于普通读者,不仅贪多嚼不烂,而且四面出击,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在书海中迷失方向,徒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朱光潜建议,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比如浮皮潦草地读许多本谈论希腊哲学的书,不如熟读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来得受益良多。著名学者、作家金克木把类似于《理想国》这样的‘原典’称为‘基础书’,后世千千万万同类书籍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础书’里发源的。

二是心中有个远景目标。民国著名学者张其昀说:“为学必先立志,自家有主意头脑,方有以自立。”意即读书人须先立个“目标”,然后才能学有所获,仿佛种树先必有根,再经浇水施肥,最后才可能茂盛生长。否则,读书人“以书为主”,势必被书牵着鼻子走,成为‘书奴’,这种阅读往往是迷茫的、低效的。在张其昀看来,读书人心里有个清晰目标地读书,即便杂览群书,也能不迷失自己,并能做到‘专而不杂,致一而不懈,故得精通’,好像一个雪球,无论滚多远,都能吸住沿途的雪花,让自己越变越大。

三是“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如果说“心中有个远景目标”是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这里的“中心”就是比较短期的、微观的。在朱光潜看来,这个读书的“中心”或是某个科目,或是某一问题。如果以科目为中心的,就要精选那一科重要典籍,逐部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获得一个概括的全貌的了解,为进一步的高深研究做准备;如果以问题为中心的,心中先有一个着手研究的问题,然后找相关书籍去读。这种“有一个中心”的读书法,其最大优点在于能做到有计划、有系统性,不至于东鳞西爪,事倍功半。当年,胡适知道顾颉刚生活拮据,有意让他标点古书《古今伪书考》,以便多挣点儿稿费。那是一本小书,胡适以为十天半月就可以完成。哪知大半年已过,顾颉刚还毫无动静。原来顾颉刚对古书中的每条引言,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和删节之处等,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大于简单的标点。又过了许久,顾颉刚告诉胡适:《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在标点和研究的基础上,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作‘辨伪丛刊’。一两年后,顾颉刚再次不满足于自己编辑‘辨伪丛刊’的计划,打算自己创作了。后来,果真如胡适判断的那样,顾颉刚成了中国史学界贡献不可限量的大学者。这就是‘有一个中心’的读书法所产生的效力。

3 “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

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在父亲的管教下,从小学开始读《近思录》《朱文公全集》《王阳明全集》,他发现这些书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便询问父亲,父亲也无法解答。到了师范学校,遇到博学多闻的单不庵老师,非常敬仰。再后来,接触了胡适、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观点,又对单老师产生了怀疑,觉得他虽博学却没有自己的见解,单老师就像沙漠的吸水一样,大量地吸收了知识,却不能喷一点点到地面上来。为此,曹聚仁总结出三条‘读书经’: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老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

这三条经验中,“怀疑”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能做到读书有疑?

首先必须不存成见。顾颉刚在《怎样读书》文中写道:读书,是要借助书籍寻出一条求知的路,而非让书来限制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基于此,顾颉刚提醒读者,读书时不可先存成见,把某一类经典当成标准,而把别的书都通通视为旁门左道。

其次不能偏食,要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就像喜欢结交与自己‘性相近’的朋友一样,很多读者只读跟自己‘情投意合’的书,对于那些趣味、观念不相近的书,往往不屑一顾,贬入冷宫。如果单纯为了消遣,这种读法无可厚非,甚至称得上是一种很健康的精神按摩。但从扩大视野、增益智慧看,同质的书读多了,难免出现近亲繁殖的恶果,无异于给自己画地为牢。因此,金克木提出一个主张——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他说,读‘异见’书,“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就像习武者,必须经常找高手过招,多挨别人的拳脚,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

陈寅恪是史学大家,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博学的人之一。他把‘读书贵在质疑’的理念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在讲授‘晋至唐文化史’这门课时,陈寅恪告诉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获取真实具体的史实,再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之,读书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的习惯。

读原书、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自由精神,这是陈寅恪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是他一生为人的根本。把读书、做学问与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知行合一,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依然至死无悔,陈寅恪先生堪称读书人的典范。

以上若干‘读书经’,是名家读书经验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无论多么独特或美妙的读书法,最终都取决于读书的‘人’。1925年,鲁迅应《京报》副刊征求十本‘青年必读书’的征文,发表了后来引发争论的一个言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随后,周作人也发表了《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周作人认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他说:“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不是书的不好。”反之,倘若是‘未通’的人,即便让他去读什么新书,也会弄糊涂。所以,周作人主张:“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读了上百篇民国名家关于读书的文字,周作人这几句话,是我最欣赏的。尤其在当下,每看到有人主张这个不许读,那个不能碰,我就忍不住想起这番话,并深深叹息。

(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出版《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过去的课堂》等)

书海观潮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坚韧如初

本报记者 梁杰

“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这是乐黛云先生在自己的最新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的一段独白。3月26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乐黛云先生的回忆录《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暨学术人生分享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分享了乐黛云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突出的学术成就。

乐黛云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乐老师除了本身有故事,有坦荡的胸襟,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他认为,过分自恋是很多人写回忆录的通病。乐老师比较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甚至有时候会自我调侃。“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乐老师一个人的自传,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风趣地说:“据说,乐老师的学生包括了好几代人。如果这样划分的话,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老学生了。乐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思想的自由、开放和活跃,和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相当融合的。”

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王守常、赵白生、贺桂梅、干春松、张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颜海平等相继发言,从各自的角度分享了他们所熟悉的乐黛云,对乐先生在比较文学、跨文化和文化思潮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乐黛云将自己一生的人生经历,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与时代的沉浮,她与命运的抗争,她对学问的追求,她对一颗颗自由灵魂的怀念,都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在这部自传中,乐黛云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教学岗位。五十岁的她,在一般人认为‘人到中年万事休’时,毅然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鲇鱼’。

乐黛云先生说:“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命”与生俱来,“运”则充满偶然;“知”意味着对知识和智慧的探求,而‘行’则意味着现实人生中的取舍与选择。人生的关键是选择,读这本书,可以看到乐黛云先生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她坚信:“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神曲》新译本 阅读新体验

本报记者 王珺

恩格斯曾评价但丁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一直以来,但丁所著的《神曲》都是当之无愧的不朽经典。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最新出版的《神曲(全三卷)》由年逾八旬的意大利文翻译家肖天佑历时多年从意大利语原文苦心译就,是近20年来汉语世界最新《神曲》中文全译本,也是首部传统诗歌体《神曲》无删节中译本,融入肖天佑教授六十载意大利文教学、翻译经验和思考。

《神曲》带给很多读者的印象都是‘难懂’,为了使读者能够读懂《神曲》、喜欢《神曲》,肖天佑经过对原文和之前几个《神曲》中译本的研究,最终决定放弃但丁原本的“三韵律”,灵活运用我国传统诗歌的形式,并使用日常语言,翻译一部更易懂的《神曲》中译本。肖天佑以‘功能翻译法’为理论依据,着重原语信息的功能,以获得原语信息希望传达的功能为追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改变译语表达方式。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他也格外注意在遣词造句方面使译文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避免使用长句子。为了进一步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肖天佑放弃了《神曲》原文中大量的注释,选择压缩注释数量、简化注释内容、改变注释排版方式,以尽可能提高读者的阅读流畅度,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译文之外,他还给每曲都配上了详细的导读,以帮助读者理解《神曲》内容,更轻松、愉悦地体会《神曲》这一经典名作的魅力。书中还配有古斯塔夫·托雷的经典版画,充分展现了《神曲》的故事魅力。

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中文版《神曲》全译本,即王维克先生翻译的散文版《神曲》。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将此次出版新译《神曲(全三卷)》看作是与但丁和《神曲》“再续前缘”,他说:“这是践行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来坚持出版经典名著、精品好书的宗旨,因为出版经典作品是商务的‘根’和矢志不移的方向与未来。”

读者回信

创建两张可以变长的书单

高子阳

教师需要一份什么样的书单?理想的教师书单应有怎样的特质?读了上期读书周刊《书单在你的阅读史里》(2021年4月7日《中国教育报》第九版),我也梳理了自己关于书单的思考。

最近,我应邀为一个市的小学语文教师做读书培训,参会者800余人。讲座中,我问:“老师们,家中藏书达到1000册的请举手。”在静静的等待中,两位老师慢慢地举起手来。“家中藏书达到500册左右的举手。”数了数,有39位老师。“出版过个人专著的老师,请站起来。”老师们为站起来的3位老师鼓掌。来参加培训的小学语文教师中,只有3位拥有两张书单,一张书单上列着他人的书,一张书单上是自己创作的书。我个人觉得,每位教师都可以有这两张书单。

李家同先生在其《大量阅读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有这样一段介绍:“美国内华达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是关于学生受教育的时间长短问题,研究调查的对象包括27个国家,共7.3万名学生。调查发现,家中有藏书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比率比起家中没有藏书的孩子,多出了20%。另外,家中藏书量若超过500册以上,孩子受教育的时间也平均多出了3.2年。而研究人员麦坎还指出,在中国大陆,家庭藏书超过500册以上的家庭,孩童接受教育时间比没有的家庭,平均多出6.6年。”从这一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家庭的书单长短决定着家中孩子的读书年限。

有一本书,叫《奇迹学校:震撼美国教育界的教学传奇》(黛博拉·肯尼著,中国青年出版社)。黛博拉·肯尼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用十年让这所学校成为全美的楷模学校。作者在书中介绍她是如何教自己3个孩子读书的,她要求他们每人一年最少要读完100本书,她将孩子读过的书带到学校,要求学生每人每年最少读完50本书,结果该校学生每年都读了超过80本书。这个真实的办学故事告诉我们,校长的家庭书单的长短与具体阅读的实施,决定着一所学校学生的阅读书单的长短及该学校能否成为一流学校。

我读中师时,知道了两位大教育家,一位是陶行知,另一位是苏霍姆林斯基。两位大教育家的人生都非常短暂,但他们留给世界的财富却是惊人的。陶行知55年的人生中留下了1200万字;苏霍姆林斯基52年的人生中,个人藏书19000册,他奇迹般地写出了40部专著、600多篇论文、约1200篇儿童小故事。读两位大教育家的作品,让那时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教育家,家里藏书应该有很多,书架上除了有他人创作的书,也要有自己写的书。在这些大教育家的引领下,一参加工作的我,就从当月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买书,所以我家的第一张书单每月都在变长。23岁那一年(工作第四年),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小学数学巧解200例》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的第二张书单中的第一本书。

这一二十年,我的第一张书单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万册了。最近几年,我特别爱买套书、全集。比如7本佐藤学的书,50卷本的《丰子恺全集》,20卷的《鲁迅全集》,36册的《巴金全集》,20卷的《朱永新教育文集》,100册的‘大家小书’……

买套书、买全集书,让我知道,一个人只有持续写作,用上一生来写作,第二张书单才能越来越长。中小学教师只要愿意做,就能拥有这两张书单。而一旦能用上几十年来创建这两张一直在变长的书单,就一定能成为一位明白之师。

(作者系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教师)